思维差异的文本体现——英汉句式结构差异的文化逻辑与翻译处理

殷雨桐

（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本文从形合与意合的角度，探讨英汉句式结构的根本差异。这种语言差异根植于东西方不同的自然人文传统、民族性格与思维模式：西方主客二分的分析式思维促成英语依靠显性语法标记的形合特征，呈现树状多层、重心前置、多用物称、被动与名词化结构的特点；而受天人合一思想影响的悟性、辩证思维，造就汉语重语义关联的意合特质，句子依事理时序铺排，多用主动、人称主语与动词，重心后置。在此基础上，文章结合翻译实例，梳理适配两类语言特征的转换策略，涵盖语序调整、语态转换、定语与状语重构、从句拆解、词性转换、增删译法等技巧。研究表明，各类翻译手段并非孤立技法，本质上是协调形合与意合鸿沟的转换路径；把握这一组核心范畴，有助于译者在忠实原文语义的前提下，产出符合目标语表达习惯的译文。

关键字：文化逻辑；英汉差异；翻译策略

收稿日期：2026 年 10 月 20 日　　**中图分类号：**H315.9

通讯作者：殷雨桐，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Textual Manifestations of Differences in Thinking: The Cultural Logic Behind Differenc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Sentence Structures and Their Translation

Yutong Y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sentence struc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orm-based and meaning-based cohesion. These linguistic differences are rooted in the distinct natural and humanistic traditions, national characters, and modes of thinking in the East and West: Western analytical thinking, characterized by a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gives rise to English's form-based cohesion, which relies on explicit grammatical markers. This is manifested in features such as a tree-like, multi-layered structure; forward-weighted syntax; frequent use of object markers; and a prevalence of passive and nominalized constructions; in contrast, the intuitive and dialectical thinking influenced by the philosophy of "unity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ity" has shaped Chinese's "meaning-based" characteristics, which emphasize semantic relationships. Chinese sentences are arranged according to logical and temporal sequences, frequently employ active voice, personal subject-verb constructions, and place the focus at the end of the sentence. 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 this article draws on translation examples to outline conversion strategies tailor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5 年中央民族大学校级项目"人工智能时代初学译者的翻译能力与数字素养提升路径"（项目编号：SJCX-Y2025203）的阶段性成果。

of both languages, covering techniques such as word order adjustment, voice conversion, restructuring of attributives and adverbials, clause decomposition, part-of-speech conversion, and methods of addition and omission.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se various translation methods are not isolated techniques but are, in essence, pathways for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form-based and meaning-based systems. Mastering this set of core concepts helps translators produce translations that conform to the target language's expressive conventions while remaining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text's meaning.

Keywords: cultural logic; English-Chinese difference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一、英汉句式结构的根本差异

要谈英汉句式结构的差异，离不开英汉语言的本质差异：英语形合（hypotaxis）和汉语意合（parataxis）。这一对概念最早由语言学家王力在《中国语法理论》中系统阐发，后经诸多学者不断深化，成为对比语言学领域描述英汉语言组织方式的核心范畴。所谓“形合”，是指英语凭借其显性的关系词——包括连词、关系代词、关系副词、介词短语以及丰富的形态变化（如时态、语态、格、数等）——来构建句内与句际的逻辑网络，使语法关系外显化、形式化；所谓“意合”，则是指汉语较少依赖形式标记，而更多通过语境、语序、语义关联和言外之意来实现隐性逻辑衔接，句子的连贯性往往依靠读者或听者的语感与语境推断来补足。

奈达（1982）在《译意》（Translating Meaning）中曾明确指出：“汉英最显著的语言学差异在于意合与形合的对比机制。”（the most important linguistic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is the contrast between parataxis and hypotaxis）。这一论断在翻译研究领域影响深远，被广泛引为英汉对比的经典表述。具体而言，英语句子如同一棵枝干分明的大树，主句为干，从句为枝，各层级之间由显性的连接词层层挂靠，逻辑关系一目了然；汉语句子则如行云流水，句与句之间少有形式上的钩连，多靠语义的自然推进和事理的先后顺序来铺排，形散而神不散。简言之，英语更注重语言的形式，以“形”驭“意”，语法关系必须通过外显手段加以标示；而中文则更注重语言的内在逻辑或意义，以“意”统“形”，形式服从于意义的表达需要。正是这一根本差异，决定了英汉两种语言在句式结构上的诸多具体分野——如英语长句的环扣式扩展与汉语短句的线性铺排、英语主谓结构的严谨性与汉语话题结构的灵活性、英语修饰语的后置倾向与汉语修饰语的前置倾向等。可以说，形合与意合的对比，是理解英汉句式结构差异的一把总钥匙，也是翻译实践中句式转换策略的根本依据。

二、“形合”和“意合”差异的根源或文化逻辑

“形合”和“意合”差异的本质在于东西方的文化逻辑。语言并非孤立的符号系统，而是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的镜像。本部分将从东西方自然人文环境、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三方面重点探讨差异产生的原因。同时，进一步对前人的观点或研究进行总结。

（一）东西方自然人文环境差异

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受到古代哲学思想“天人合一”的深刻塑造，十分注重事物发展的整体性与关联性。这种哲学预设倾向于将人与世界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主体与客体之间不存在截然的界限，对事物的把握往往依赖于直觉体悟而非分解剖析。反映在语言组织上，汉语的表达便呈现出一种以意义统摄形式的倾向：词语与词语、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联系，主要不是靠外显的语法标记来维系，而是靠语义的自然流淌与语境的内在呼应来贯通。杨元刚（2011）将这一特征概括为“通过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联系，凸显多归一的思想，在表达方式上也注重从具体到一般的表达方式，形成了中文的表达特点：按时间发展顺序由因到果、由先到后、由大到小地进行表达。换言之，汉语句子的铺排遵循的是事件发生的自然时序与事理逻辑的先后次序，先发生的事情先说，原因在前，结果在后，整体框架由小及大、由具体到概括，层层推进而不依赖形式上的钩连。这样的思维方式造就了汉语的“意合”特征，即

通过语义来实现句词的联系，实现中文内在的逻辑联系。句与句之间可能没有连词,没有关系代词，甚至主语也常常隐含不露，但读者凭借对语境和事理的体认，仍能准确把握其间的因果、转折或递进关系。看似形散,而意不散,这正是汉语以“神”驭“形”的组织智慧[1]。

而英语的形成和发展则受到古希腊“天人相分”思想的影响。西方哲学传统倾向于在主客体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将自然视为独立于人的认知对象加以审视和分解，这种分析性的取向在语言层面便表现为对形式标记的高度依赖。英语通过语法规则来凸显句子内部的逻辑关系，注重“由一到多”，即从一个核心的主谓结构出发，借助各种形式手段向外扩展、层层挂靠。杨元刚（2011）指出，英语在思维方式上是由一般到特殊的表达方式，句子建构的中心则是主语和谓语。这一判断揭示了英语句子的构造逻辑：主语与谓语构成句子的骨架，其他成分无论是定语、状语还是补语——都必须通过显性的语法手段标明其与核心结构的关系。例如，通过使用从句的方法，以原来的主谓结构为中心，通过其他能够凸显句子中形式关系的分词、介词、连词等词语，将各种修饰、限定、补充成分有条不紊地附着于主干之上，形成一种树状的分层结构。每一个层级之间的从属或并列关系，都有相应的形式标记加以标示，逻辑脉络清晰可辨。杨元刚（2011）进一步将这两种语法类型概括为：汉语是一种“语义驱动型语法”，英语则是一种“形态驱动型语法”。前者以意义的完整传达为旨归，形式服从于语义的表达需要；后者以形态的完备为组织原则，语义关系必须经由形式手段加以确认。达到英语的“形合”，即通过显性的语法形式手段来实现句内与句际的逻辑衔接，使句子在形式上自足、在逻辑上严密。

（二）东西方民族性格差异

西方文化较为直率奔放，这为英语语言的形合机制奠定了坚实基础。而相较于西方，东方人的民族性格则较为含蓄内敛，这使得中文语言通常会有“言外之意”，更注重语言的内在逻辑，也为中文的意合机制奠定了基础[2]。

（三）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

首先，英语通常采用理性思维，而汉语通常采用悟性思维。这一分野在句法层面表现得尤为显著。英语句法严格，必须遵循语法一致、意义一致和就近原则等，且必须遵循主谓结构，这是“主客二分”客体思维模式的体现。西方哲学传统在主客体之间划出明确界限，将外部世界视为独立于认知者的客观对象加以审视和剖析，反映在语言上便是对形式规则的恪守与对逻辑关系的显性标示。句法的显性也导致了逻辑的显性:句子内部各成分之间的因果、条件、让步等关系，均须借助连接词、关系代词、介词短语等形式手段加以确认，读者无需过多依赖语境即可把握句意。有学者将这一特征概括为英语语法是一种“形态驱动型语法”，即语法形式决定意义表达的组织方式。

汉语通常是以辩证逻辑为基础的悟性思维。汉语句法呈“柔性”，没有较为严格的语法规则限制,且主语可以隐藏。这导致汉语的句法极为灵活，甚至有些汉语的句子可以左右通读，含义仍相同。例如“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正读反读字序完全一致，语义亦通，这在英语中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英语的形态标记和语序约束不允许这种回文式的自由。汉语的柔性句法为这种文字游戏提供了空间，也折射出汉语组织的高度灵活性与对语境的高度依赖。再加上汉语多为单音节字,同音字多，导致仿拟等修辞现象和谚语的出现，产生了悟性思维。同音异义为双关、谐音仿拟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单音节字的灵活组合又使对仗、回环等修辞格式得以自然生成。这些语言事实反过来强化了汉民族重领悟、重意会的认知习惯：读者需要在语音与语义的多重关联中自行捕捉言外之意，而非依赖形式标记的指引。有研究指出，汉民族强调主体意识的悟性思维，在语言中的体现便是汉语句法的话题句优势，句子以话题为起点展开，主语与谓语之间的关系往往依靠语义关联而非形式一致来维系[3]。

其次，英语习惯对抗性思维，中文习惯调和性思维。西医对抗疾病时通常采用“消灭”的方式,将病灶视为需要清除的对立物。受“天人相争”思维的影响，英语句子向外扩展，这导致了认知主体向外征服世界的思维。句子以主谓结构为核心，借助从句、分词、介词短语等手段不断向外延伸、层层挂靠，形成一种树状的分层结构，每

一层级的从属关系都有形式标记加以确认。英文句子多用物称做主语，体现了英语的“客体思维”，把观察世界作为分析、推理和研究的中心（包惠南，2001）。物称主语的使用使句子得以摆脱人的主观视角，让事物以客观的面貌呈现自身，这正是客体意识在语法中的沉淀。有研究将这一倾向概括为英语的“非人称倾向”，认为它反映了西方民族将观察对象置于独立于主体位置加以审视的认知习惯。

治疗疾病，中医通常使用“调和”的方式，着眼于恢复机体内部的平衡与和谐，而非消灭某一对立因素。受“天人合一”影响，中文句子向内拓展（张岱年，2009），反映了“平等”与“和谐”的观念。句子不以某一个核心结构为唯一支点向外挂靠，而是围绕一个话题或事理线索向内聚拢，各分句之间关系平等，靠语义的呼应和事理的顺序自然衔接。汉语讲究事在人为，因此多用人称做主语，以人为叙述的起点和中心，人的行为、感受与判断构成句子的基本内容。这种人称倾向与英语的物称倾向恰成对照，前者以主体为出发点观照世界，后者以客体为出发点呈现事理。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汉语的人称倾向反映了中国人的主体意识，而英语的非人称倾向反映了西方的客体意识，两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需要相互转换，以符合各自语言的表达习惯。

三、英汉具体句式结构差异及翻译处理

本部分将根据英语形合和汉语意合这一根本差异，探讨英汉在句式结构方面的具体差异，并就每一种句式结构差异给出翻译处理策略、翻译技巧和案例，方便进行学习、总结或者归纳。

（一）语序调整

英文习惯先说重点，而中文习惯把重点放在最后。这一差异与英汉句子的信息组织方式密切相关：英语倾向于将核心信息（结果、结论、态度）前置，把原因、条件、背景等次要信息后置，形成“先果后因”“先主后从”的语序格局；汉语则往往按事理发生的先后顺序铺排，先交代原因、条件或背景，再引出结果与结论，形成“先因后果”“先偏后正”的表达习惯。因此在翻译时，可以适当调整语序，使语句符合中英文表达习惯。例如，“He failed the exam as he didn’t study hard.”可译为“由于学习不努力，他考试没及格。”原句以“He failed the exam”这一结果开篇，原因状语从句后置补充说明；译文则将“由于学习不努力”提至句首，先因后果，既顺应了汉语的叙事逻辑，也使句子读来更自然顺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语序调整并非机械的“一律倒置”，而应视具体语境灵活处理：当原因、条件等信息在原文中带有强调意味，或汉语表达本身允许结果前置时，也可保留原有次序，关键在于使译文的信息重心与汉语的表达习惯相契合[4]。

（二）语态变化

英文多习惯用被动语态，而中文习惯用主动语态，因此在翻译时，译者常常将被动语态转换为主动语态或不译出“被”字，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将“被”字翻译出来。例如，在“The ancient castle was destroyed by a severe earthquake in 1906.”这句话中，可以将被动句转为主动句，并将状语前置，译为：“1906 年的一场强震摧毁了这座古堡”。

英文多习惯用被动语态，而中文习惯用主动语态，因此在翻译时，译者常常将被动语态转换为主动语态或不译出“被”字，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将“被”字翻译出来。例如，在“The ancient castle was destroyed by a severe earthquake in 1906.”这句话中，可以将被动句转为主动句，并将状语前置，译为：“1906 年的一场强震摧毁了这座古堡”。原句以受事“The ancient castle”作主语，施事“a severe earthquake”由“by”引出并后置，时间状语“in 1906”置于句末；译文则将施事“一场强震”提为主语，受事“这座古堡”转为宾语，时间状语“1906 年”按汉语先时间后事件的顺序前置，全句由被动转为主动，既保留了原意，又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需要补充的是，被动转主动并非唯一的处理方式：当受事者需要突出、施事者不必或无法说出时，汉语也可采用意义上的被动句，如将“The castle was destroyed in 1906.”译为“这座古堡于 1906 年毁于一场强震”或“这座古堡在 1906 年被毁”，前者以“毁于”化被动为主动，后者保留“被”字而语气自然；只有当原文被动句带有明显的遭受意味或需要强调被动关系时，才宜译出“被”字。可见，被动语态的翻译应根据语境、信息重心和汉语表达习惯灵活选择，不宜一概而论。

（三）定语排列

不论是在中译英还是英译中的过程中，都应当注意定语的译法。在翻译多重定语前置的句子或短语时，由于中文和英文的多重定语基本配列原则相似,均为限定性前置定语（例如数量、所属）、描绘性前置定语（好坏或形状、色彩），再是分类性前置定语（国别、材质等）的次序，在翻译时可以不做过多改动。例如“this pretty royal botanic garden”可译为“这个漂亮的皇家生物园”。汉语中的定语通常前置，而英语中的定语可能前置，也可能后置，甚至可能在两边都分布。因此，在翻译多定语的英文句子时，英译汉时，可以按照定语与中心语的紧密程度排列定语顺序；汉译英时，应先按照英文表达习惯确定定语的位置，再按照限定性定语、描绘性定语、分类性定语的次序排列定语。例如，“It was a small, old, wooden bridge over the quiet river behind the ancient village.”可译为“那是一座位于古老村庄后面、横跨静谧小河之上的陈旧小木桥”。而在汉译英中，“她买了一条从上海带回来的、漂亮的、手工制作的、丝绸围巾”可译为“She bought a beautiful handmade silk scarf brought back from Shanghai.”

（四）状语调整

英文中的状语在翻译中有时也可以单独拆分出来，这样不仅使句子更通顺，还更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这是因为英语状语形式多样、位置灵活，常以副词、介词短语、分词短语等形式紧凑地嵌入句中，与主干紧密钩连；汉语则较少依赖形态标记，状语过长时硬塞入句容易造成句子臃肿，因此常将其拆出另立一句。例如“Those Chinese scientists in Silicon Valley are understandably proud of their achievements.”可译为“这些在硅谷工作的中国科学家对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很自豪。这是可以理解的。”原句中“understandably”是嵌入式的评价副词，若直译为“可以理解地”，读来生硬拗口;译文将其拆出另立一句，既保留了评价语气，又使前句回归汉语自然的表达格局。需要注意的是，拆分应视状语的性质和长度而定，评价、态度、条件、结果类状语拆分较为妥帖，简短的方式、时间状语则多可随主干译出，关键在于拆而不散、语义连贯。

（五）从句转换

英语为形合语言，习惯使用从句表示逻辑关系，而汉语通常结构相对简单。因此在翻译中遇到从句时，需要通过分析结构，寻找合适译法。在翻译定语从句时，可以根据从句长度来决定将定语从句前置还是后置。有时定语从句也可以译成各种类型的状语或转换成其他类型的从句，甚至译成独立句子。例如，“He wrote a book which quickly became a bestseller and inspired a generation.”可以翻译为“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迅速成为畅销书，并激励了一代人。”英文的状语从句也可以使用分句、合句或移位的方式。例如，“He stole, not because he wanted the money but because he liked stealing.”可译为“他偷窃的目的不是钱，他就是喜欢偷。”

（六）其他翻译技巧

除上述翻译处理外，还可以增译、减译或省略的方式使源语表达的内容具体化或抽象化，使译文更符合目标语的语境。例如在英译中时可以适当增补主语成分。还可以使用词性转换的翻译技巧。英语多用名词，中文多用动词，因此在英译中时可以将名词转换为动词，有时甚至可以将英文中的介词转换为动词。在翻译时，也应当根据文章内容和背景选择不同的翻译技巧，例如经济类文本和广告类文本应采取不同的翻译技巧。

四、总结

综上所述，东西方自然人文环境、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了英文和中文句式结构的差异——“形合”和“意合”。自然环境的差异提供了初始条件，民族性格的分野构成了社会心理基础，思维方式的对立则是直接的认知中介，三者层层递进，共同塑造了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组织策略。由此我们总结出了中英文更多的句式结构差异:中文喜主动、多主语、多动词，习惯重点放后，定语前置，英文则喜被动、多从句、多名词，习惯重点放前。具体而言,汉语倾向于以人为叙述起点，多用主动句和人称主语，动词使用频繁，句子按事理先后顺序铺排，重点往往置于句末，定语多前置；英语则常用被动句和物称主语，从句层层挂靠，名词化程度高，核心信息前置，定语多后置。根据句式差异，我们又总结了移位、分句、合句、

词性转换和语态转变等翻译方法。这些方法并非孤立的技术手段，而是针对上述具体差异形成的转换路径：移位法对应语序重心的调整，分句法与合句法处理英汉长句与短句的相互转化，词性转换化解多动词与多名词的对立，语态转变则解决主动与被动的取舍。各类方法相互配合，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在“形合”与“意合”的根本差异之下，使译文既忠实原意，又符合目标语的表达习惯。

参考文献：

[1] Eugene A. Nida & Chr.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 Leiden: E. J. Brill, 1982.

[2] 包惠南 . 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 [M]. 北京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3] 杨元刚 . 英汉语法形合意合特征的对比研究——兼论洪堡特的汉语语法观和语言哲学思想 [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1）: 120–124.

[4] 张岱年 . 中西哲学比较的几个问题 : 冲突·互补·共存 [A]. 上海 :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2009.

作者简介：殷雨桐（2003–），女，汉族，北京人，硕士，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笔译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技术、语料库翻译学和汉英翻译。